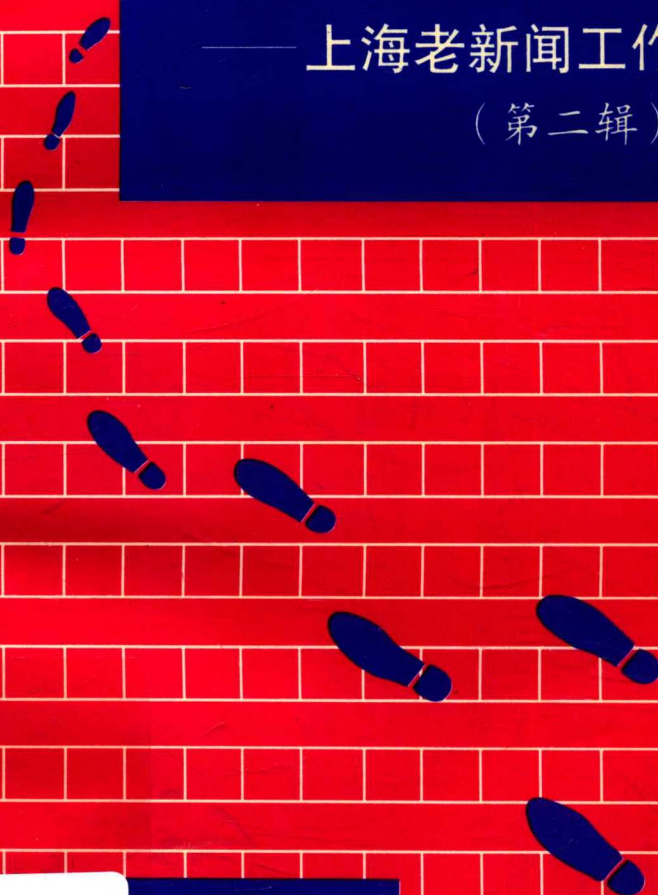


我们的脚印

——上海老新闻工作者的回忆
(第二辑)



工作者协会编

我们的脚印(第二辑)

上海老新闻工作者的回忆

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编

(上海市汉口路 274 号)

文汇报工贸印刷厂印刷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印刷

开本 850 × 1168

字数 350,000 印数 1—3000 印张 14.25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内部资料准印证登(97)290 号

每册成本费:12 元

前 言

《我们的脚印》第二辑终于出版了。这是 112 位新闻老战士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的数十年新闻生涯中感受最深、也最值得回忆的片断经历。作者都是年逾花甲、古稀耄耋之年的老同志，在见到第二辑征稿启事后，就热烈响应，动手撰写，不少同志不顾年迈体弱，日夜执笔，有的甚至抱病赶写。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编委会确定了一个原则：尊重作者，尊重原作，除文字上略作必要的修饰之外，尽量少作或不作改动。

收入本辑的 112 篇作品，概括起来是“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八个字。其中有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新闻工作的耳提面命；有在各种不同的新闻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艰苦卓绝地胜利完成任务；有在各种特殊环境里按照党的指示坚持原则、按新闻规律办事；以及在国民党反动派和敌伪血腥统治下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报……等等动人事迹。这些事迹，似可供新闻史研究作参考，似可供新闻教育作素材，当然也可供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学习借鉴。

第二辑的编委会由正副主任刘庆泗、林宏及委员高宇、张林岚、金尚俭、温崇实、任嘉尧、封光汉等组成。除各按主要新闻单位分工组稿、编稿外，其余均由温崇实、杨怀鲁两位不辞辛劳完成善后扫尾工作。我谨代表上海老记协向上述各位同志致以深切的谢忱。这里需要特别提一下的是，此书得能出版，全靠各新闻单位精神上的关心支持和物质上的资助，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书中难免尚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恳切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夏其言 1997 年 12 月

目 录

战争——党和人民	陈 沂	1
大学助教乐趣多——最难忘的一件事	杜绍文	9
用电波报道抗战之声	王 孚	11
严宝礼和《文汇报》	任嘉尧	13
《立报》——我的大学	于 友	18
没齿难忘仇和恨	谢蔚明	21
最后撤离南京的一家民间报纸	方秋苇	24
我参加新闻工作的回顾与体会	宋立平	27
周恩来同志的教诲	徐 炜	30
“孤岛”两度历险记	顾雪雍	34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记一次出生入死的采访 ..	冯英子	37
敢讲真话的《侨声报》	曾莫休	42
敌后水上印刷厂	吴以常	45
桂南战地漫忆	吴 淞	49
唱着战歌走过来	黄 莘	55
香港《光明报》忆往	朱庆洽	58
重庆香港一线牵	白广荣	61
从军事台到新闻台	谭晓亮	63
在《滨海报》初创的日子里	马 达	66
一件宝贵的纪念品	高 宇	72
我的起步	田 野	74
邓拓在敌后办报	汪解民	76
学步	杨 瑛	78

在麻木不仁的山城中怒吼	郑永欣	81
大智大勇的副刊编辑——记陈向平同志的几件事 ..	谷斯范	85
美好的回忆——我的记者生活片断	邱 枫	90
望断天涯迢迢路——记我迈入新闻殿堂的一段经历	邵 琼	93
回忆《世界晨报》	冯亦代	98
肩缠红布条 登上敌城头 ——采访解放淮安之战追记	王 维	101
不期而遇的机缘	袁 鹰	105
革命前辈的教诲	苗力沉	108
《张庄肉市》采写经过	叶 诚	111
南京的前尘梦影	黄 裳	113
忆《学生新闻社》	冯 皓 庄人葆	117
冬梦——去东北解放区	邵嘉陵	123
我们从这里起步	沈尔厘	128
难忘的十六年	印 辉	131
忆《新民晚报》往事	高本乐	135
青春年华的脚印	杨志诚	139
我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行动准则	刘庆泗	143
在劝工大楼血案现场	徐之华	147
《大众日报》的油印号外	吴学思	150
犹忆天寒访路尸	陈 迟	152
在中国新专的最后一段日子	欧冠云	155
回忆毛主席接见《晋绥日报》编辑人员	胡 也	158
“红小鬼”火线办报记	陈进鹏	162
硝烟未散的早晨	张林岚	167
“长治号”起义记	袁逸波	171
雪泥鸿爪忆华年	阿 章	173

乘风破浪登舟山	全一毛	177
不能忘记血债	沈涯夫	182
一次难忘的宣传任务	黄梨贞	185
和时间赛跑的一则新闻报道	董为焜	187
我当记者前后	何子葭	189
难忘金公教诲	蔡 平	195
永远的怀念	梅 朵	197
探索盖派艺术的脚印——追忆初访“燕南寄庐”	之 江	201
忆苏南行	周光楣	205
我当过“检查官”	李卓敏	211
与冯小秀共事的日子	吴崇文	214
入朝日记(三则)	周尊攘	218
柴达木之行——写石油通讯的教训	黄正岩	224
《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诞生	张 默	227
姚文元打我一棍子	任嘉尧	232
《朝花》初创期琐忆	张世楷	236
周总理和教师话家常	周兴美	241
踏入风浪圈	束纫秋	245
一曲绝唱酬知音		
——采访金嗓子周璇录音报道追记	汪韵之	249
新闻记者的特殊作用		
——忆被派往永大厂去的一次采访	陆泉源	254
一次不平常的广播大会	刘念曾	257
迟到的忏悔	唐成中	260
舞台以外的故事	毛绿嘉	263
电视促我奋进	许 诺	267
杂忆《为钢而战》	刘继汉	272
一次难忘的国外采访		

——记毛主席透视反华逆流的批示	屠培林	275
一次难忘的采访	沈国祥	280
“跟踪摄影”的体会	赵立群	282
回忆陈云同志对评弹和广播的关怀	何占春	287
在建设人民大会堂的日子里	陈居樽	293
留下的一个脚印		
——追忆欢庆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的广播报道	宇文广	297
交白卷	华将谟	301
和毛主席一起过节	邹凡扬	305
一次特别任务	朱 盾	312
总编辑与读者		
——王维同志教我重视读者来信工作	陈柏贞	315
从实践到理论的一次采访	王绪生	318
驻省记者生活琐忆	陈念云	321
请周总理审稿	张伏年	328
电视新兵二、三事	宋 丹	331
高炮兵大比武小记	丁子美	335
“把心交给读者”——巴老的教诲	陈 醇	338
从记者到大使	王 殊	341
颂优秀园丁与护士	吴培恭	345
解放思想宣传新生事物	吉景峰	352
为科学的春天增色	苏瑞常	357
宣传精神文明的一个范例		
——回顾“三街一场”评选双佳活动	徐学明	360
批评是为了擦黑		
——记一次突击性的采访	夏其言	365
从业余作者到专职评论	干 城	370

解放日报与振兴中华读书活动	史 东	373
提高职工的文化素质		
——《劳动报》增出职工文化辅导专版追忆	万瑞章	378
太阳花——玛格丽特——采访英籍女教授	游凤麟	383
迎风踏雪送旧岁	江 南	389
邓大姐关心新闻记者	黄 俭	393
一年跨一步	丁锡满	398
访大秦线	倪 平	405
《证券报》的诞生前后	陈文灏	409
敢为天下先的“中国广告一号”	张启承	412
自费采访足球世界杯赛		
——我新闻生涯中难忘的一页	李庭昆	418
采访刘连仁的前前后后	欧阳文彬	423
一张请帖 一份考卷	徐 行	429
怎样减少报纸差错的体会	孙文祥	431
校对六十年	周大煜	435
校对工作之我见	毛恭谨	439

战争——党和人民

陈 沂

我是 1942 年初春来到山东的。先到鲁西，后到沂蒙，再后到滨海。在滨海第一次见到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他告诉我，原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大众日报社长李竹如同志，已调到山东战时工作委员会任秘书长，他所遗留的职务，分局决定由我去接替。这样，我就到了大众日报社。

这时抗日战争已进行了 4 年多，但敌后山东的形势却很严峻，地区分割，常处在日、伪、顽军的夹击、封锁和进攻中。在军事上，和敌人比，我是劣势；和友军比，我也是劣势。

更重要的是，当时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山东纵队三个主要领导机关，还分散在三个地方。虽然他们的主要负责人各自都是分局委员，有时也在一起开会，讨论一些问题，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没有完全统一思想，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集体，来统一领导山东的抗战。

而日寇，从 1939 年起停止正面战略进攻，把重点转向敌后抗日根据地，疯狂进行“扫荡”、“封锁”、“蚕食”，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政策。从 1939 年到 1940 年，敌人在山东千人以上“扫荡”达 25 次，万人以上两次，特别在 1941 年冬天，调集 5 万重兵，对我山东腹地——沂蒙山区施行铁壁合围、梳篦战术，妄图一举消灭我山东分局、省战工会、一一五师、山东纵队首脑机关，“扫荡”长达两月之久，使我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与此同时，

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继“皖南事变”之后，山东国民党顽固派也趁机在鲁南制造“银厂事变”，杀害我鲁南区党委书记赵博同志。

由于日寇、伪军、顽军夹击，我根据地被分割、封锁、蚕食，日益缩小，交通阻塞，加之灾荒严重，军需民食极端困难。1942年开始，就面临着更为艰难、严重的局面。

我作为山东大众日报社长，又主持分局宣传部的部务，虽然初到，面临这个局面，也不能不考虑这个局面，常和党内、军内、政府内一些同志交谈、研究，山东今后如何继续坚持抗战，打破这种艰难的被动局面。

尽管如此，我还是比较乐观和有信心的。我在太行山呆过，在河北、鲁西、冀鲁豫呆过，比起他们来，我觉得山东这个根据地还是挺不错的。有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人口，党有山东分局，政府有战时工作委员会，主力有一一五师，地方部队有山东纵队，还有鲁西、鲁南、鲁中、滨海、胶东、清河、冀鲁边几个大小不同的根据地，而且都已建立了区党委、行署和军区，以下还建立了地委、专署和军分区，一直到县、区、村三级党委和政府。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还有带领一一五师主力部队来到山东的罗荣桓、陈光、肖华等老红军、老干部，加上地下党人黎玉同志和他从延安带来的一些老红军、老干部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强大力量。因此，敌人通过已占领的津浦、胶济、陇海三条铁路线和一些公路、河流对各个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我们还是可以互相策应、互相联系、互相支援的。就拿《大众日报》说，还是铅印，还有那么一些知识分子、印刷工人，发行近一万份，比我在太行山区、河北冀南、山东鲁西办石印报强得多了。所以我决心在山东分局领导下，把《大众日报》办好，成为名副其实的山东人民的喉舌，山东分局的机关报。

但在实际的办报工作中，仍然感到山东党没有很好的总结，因

而反映在报上还是一般化的宣传报导多,思想的中心不明确。从我当时的水平,对于党内思想斗争的复杂性没有体会,对王明的右倾投降路线在山东某些工作上的一些反映没有认识,更没有悟到山东党当时在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上还有哪些问题。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正是山东党当时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许多人都处在不明白或完全不明白中。

就在这个时候,刘少奇同志从华中来山东。他是在返回延安途中,受中央之命,路过山东来帮助检查工作的。少奇同志长途跋涉,穿过日寇严密封锁的陇海铁路,于1942年3月下旬来到山东滨海区——中共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师部驻地临沐县朱樊村。看来中央这时已经了解到山东的问题。所以他一到山东,就不顾疲劳,深入群众调查访问,了解群众组织、减租减息、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阶级关系等情况。他还和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山东纵队、省战工会的负责同志分别谈话,听取汇报。各部门干部主动向他反映情况和意见,他都耐心听取。还组织随行同志仔细翻阅山东党政军各方面的有关材料和阅读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和党报《大众日报》。

少奇同志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认真分析以后,认识到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在他的提议下,山东分局召开了会议。会议由分局书记朱瑞同志主持。少奇同志在会上充分肯定了山东工作的成绩,同时严肃指出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引导大家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对照实际情况进行检查,从思想路线上找原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几天讨论,取得了一致认识。接着召开了有部分县委书记参加的干部扩大会议,从4月25日开始,共开了8天。会上,朱瑞同志作了《山东抗战四年来我党工作与今后任务》的报告,着重对形势估计、独立自主方针、群众工作、锄奸政策、领导作风、党内斗争等几个主要问题,作了详细检查,并提出改进意见。少奇同志对山东工作作了全面指示,并针对

山东存在的问题,专门作了《群众运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与策略问题》、《党内斗争问题》、《思想方法》(即“人为什么犯错误”)等重要报告。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自己的实践经验,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使与会同志受到教育。大家一致反映,今后方向明确了,工作有办法了,对克服困难,改变山东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争取胜利,充满了信心。

记得当时听少奇同志的报告,当他说到山东面临困难的严重局面时,严肃指出是山东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水平幼稚、路线觉悟不高,我感到十分震惊。但事实说明,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正是这个问题。

在少奇同志的亲切关怀、耐心教导和帮助下,山东党总结和解决了几个重大问题,从而达到统一认识。

首先是对形势的认识。抗战以来,山东各项工作成绩很大,党组织扩大,军政从无到发展壮大,建立了政权,为坚持抗战创造了条件。问题是党中央 1939 年 12 月指示“在山东争取优势”的任务没有完成,所以在山东敌友我力量对比,敌仍是第一位,友为第二位,我只是第三位。但有的同志对敌友我各方面的情况不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主观认为我已取得初步优势,盲目乐观,满足于一些表面现象。因而敌人一“扫荡”,顽军一夹击,我就被动应付,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导致极端困难的局面。少奇同志说:“今后只要不犯错误,条件好转有可能,否则,重复这一局面也有可能。由于根据地被分割、蚕食,战略上起了某些变化,革命处在低潮,今后可能更艰苦一些。同志们要振作起来,准备担负艰巨任务,坚持斗争,至少两年,直到最后胜利。”

根据少奇同志指示,分局决定当时的总方针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动员起来,团结全党、全体人民,咬紧牙关,继续坚持长期抗战,巩固各根据地,加强游击区,积极反扫荡、反蚕食。运用一切斗争方法,积蓄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条件”。

贯彻这一系列战略方针,在对敌斗争策略上,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善于隐蔽力量,巩固阵地,加强对敌政治攻势,加紧瓦解敌伪军工作,深入敌伪点线及附近地区活动,争取扩大某些根据地。对敌人“扫荡”、“蚕食”,则予以有力的打击。同时,在根据地或游击区,彻底实行精兵简政,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指挥部等机关,带头将过去1万人减为3千5百人,干部层层下放,旅长下去当团长,真正做到机关精简,群众化,战斗化,以适应战争情况和减轻群众负担。这些措施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对敌斗争逐渐转入主动。在敌占区和敌据点周围,我都能进行胜利活动,敌人出扰“扫荡”,我可以及时了解,决定对策。

其次是对群众工作的认识。少奇同志对山东群众工作指示说,我们所说的群众是指基本群众,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劳动者。群众工作在山东根据地是最薄弱的一环,过去存在不应有的轻视,但这一工作又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要想把其他工作做好,首先要依靠群众,把成千上万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起来。现在为什么很迫切呢?因为时机重要,夏收到来,许多贫苦者都要求减租减息,这个时机最容易组织发动群众。

少奇同志的深刻教导和严肃批评,给大家敲起了警钟。当时在山东对基本群众的力量估计不足,而对中间势力过于信任,强调依靠中间阶层、中间势力的统一战线。所以群众根本没有很好地发动起来,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的政策也没有真正贯彻下去,基本群众的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由于基本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也就不可能从他们的切身利益上关心党的事业,因此我党我军和群众的关系就象水上浮萍。由于基本群众的优势没有树立起来,群众组织、政权建设、党的基础就不巩固,经不起敌人的摧残,也不能很好地开展游击战争。这是极为沉痛的教训。分局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当即于5月4日发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决定要求自麦收到年底,各根据地都

要把这一工作作为第一位的中心任务抓好。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少奇同志身体力行,坚持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他对朱瑞同志说,减租减息既然是中心,就要党政军民干部一起抓,要抽调大批干部先学习一、两个星期,下去后都以农会面目出现,由农会领导,真正代表群众利益,不要成为政府的附属机关。运动首先要搞点,中心突破后,再在面上展开。

分局根据少奇同志指示,组织两个大型工作团,一个在莒南县大店一带,一个在临沐县大兴镇一带。在运动过程中,少奇同志亲自到村了解情况,及时提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发动斗争,要使群众自觉自愿行动,不能包办代替,政府只掌管法令,如地主翻脸,则要群众斗争,以法令使他减。少奇同志还指示,要把不同类型点上的干部相互对调,交流经验,共同提高。少奇同志特别注意运用报纸交流经验,指导运动,他曾多次找我谈话,具体指导。运动刚布置,《大众日报》头版就发表了《如何打开减租减息的大门》的社论,指出过去减租减息没有开展起来的原因和如何开展起来的办法。以后《大众日报》关于减租减息发表的十几篇社论,其中包括向地方士绅进一言等,都是在他的指示下,结合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写成的。这对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群众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给我本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未忘。

再是关于统一战线的认识。那时山东党的统战工作虽也作出过大的成绩,但同时某些人中,也不同程度受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影响,所以在当时执行统一战线上出现过偏差。主要是在于领导上缺乏独立自主领导全省人民进行抗战的思想,过分信任甚至帮助发展中间势力,贯彻党的“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不力,以致丧失了许多发展壮大机会。例如抗战初期,国民党各级政府纷纷弃职逃跑,我们就没有及时抓住机会,建立政权和根据地。鲁南顽固派王洪九部有一个营,本来我们党在那里的基础很好,营长要求拉

出来编入我军,但有人唯恐得罪王洪九,破坏统一战线,后来这个营长被杀害,支部被破坏,全营瓦解。所以少奇同志说:“在山东对当时的顽固派,我们本来是可以争取优势的,就是因为我们过去思想上不明朗,许多机会没有抓住。”他又说,对顽固派为什么要争取优势呢?这是因为中国革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革命是不能胜利的,而只有力量占优势,才能有领导地位。

还有人在贯彻统战政策中,对中间势力动摇性认识不足,片面强调联合,斗争不力。韩复榘不战而逃,国民党派沈鸿烈来代替,我们当时竟表示“热烈欢迎沈主席统一领导山东抗战”。鲁中山区腹地沂水县东里店一带,是山东纵队四支队开辟的,也让给他们,结果反共顽固派秦启荣部乘机制造太和惨案。少奇同志当时以大量的事实批判了王明的“一切为了”、“一切经过”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危害,反复说明统一战线是又联合又斗争,就是又拉又打,拉他抗日,打他反共反人民,联合不是无原则让步,不是屈膝投降,更不能被其利用反我们,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不是把他们赶到敌人方面去。少奇同志根据这些原则,还对顽军如何进行联络工作作了具体指示,还帮助分局正确地解决了当时一小部分进步的国民党员和为数不少的高、中级知识分子自动组织国民抗敌协会的问题,大大发展了山东的抗战形势。

少奇同志来到山东后,还实事求是地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很注意从各方面了解锄奸政策执行情况,特别重视让有关部门同时拿出具体案例进行审查,每个案例都问明侦破审讯经过、定案的根据。少奇同志向这些同志说:我们是共产党,真理在手,对任何案件都不能肉刑逼供,更不能轻信口供,定案时三项缺一不可,决不能轻捉轻杀。这个问题,在历史上,特别“左”倾路线时期,不知吃过多少苦头,冤枉多少好同志,今后不能再重演。

在少奇同志帮助下,分局于5月作出《关于纠正泰山区锄奸错误的决定》发至各地认真执行。罗荣桓亲自主持分局、一一五师、

山东纵队指挥部等保卫机关的工作,保卫干部认真复查,凡属搞错的马上平反,分局保卫部长刘居英、组织部长李林还亲自登门道歉。

这个问题对于山东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最后,也是山东党政军民十分关心的山东党统一领导的问题。在少奇同志帮助下经过个别交谈,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统一了大家认识,作出决定:分局、一一五师、山东纵队指挥部合并办公,分局集中领导。军事上统一指挥,成立山东军区,罗荣桓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实行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体制,自上而下,统一指挥,协同作战,从而加强团结,步调一致,为争取 1942 年形势好转,创造了前提条件。

少奇同志回延安后,不久朱瑞同志调回延安,中央任命罗荣桓同志任分局书记,实行了一元化的领导。

现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我在 1942 年至 1945 年写的社论、专论文集,我回顾一下这些文章,都是在刘少奇同志到山东后一系列指示精神和原则下写成的,充分体现了:战争——党和人民这一命题。抗日战争如此,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另一种战争,也需要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参与、支持,否则,一切都谈不到。文集中所有的文章,都是在这个战争——党和人民的精神下写成的,首先要归功于刘少奇同志到山东,我个人只起了一个阐述者和传达者的责任。

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开始,在东北我同罗荣桓同志谈起山东分局后来局面转变,直到取得胜利的原因何在,他说,一元化的领导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还是我们老老实实在地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点,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也要老老实实在地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指示办事。

大学助教乐趣多

——最难忘的一件事

杜绍文

我有幸两度担任大学助教职务,时间都不怎么长: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为时仅一个学期(1931年2~8月);杭州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也只是一载(1932年9月~1933年8月)。前者主管是系主任谢六逸教授,后者主管是徐蔚南教授和胡寄南教授。

大学助教的具体工作很繁杂,既是教师与学生间的联络员,又是学校与师生间的行政助理员。总之,凡是主管教师的公私业务,只要有所嘱咐,都是耳提面命,全力去办,事后又须如实汇报,总结得失。

震惊遐迩的1930年广东“八二风灾”,吾家经营的海滨农田,一夜之间沦为沧海,我在复旦新闻系的学杂生活费用无着落。这对于只有一学期便可毕业的我,真如晴天霹雳,一片茫然!所幸天无绝人之路,当时复旦新闻系主任谢六逸先生(字宏徒,贵阳人,日本文学专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同情我的遭遇,给我雪中送炭,派我充新闻系兼任助教,每月领助教半薪,法币40元。当时币值比较稳定,维持学习和生活费用绰然有余。谢六逸老师真是我没齿难忘的恩师。

浙江大学的直接导师,先后有二位:一位是江苏省吴江县人徐蔚南,曾留学法国,长于法国文学翻译,久任上海世界书局总编辑。